

從「華人性」到「後華人性」 ——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劄記

From “Chineseness” to “Post-Chineseness”:
Research Notes of Chinese in Malaysia

石之瑜 (Shih, Chih-Yu)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李慧易 (Deanna, Lee)

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媒體學系講師

摘要

「後華人性」的形成，在於因應在地情境而衍生出的不同文化記憶，繼續使用相同的文化資源，確保了華人與華人之間的相處模式、共事及對中國的情感，其間儼然具備某種隨時可以重新分享的概念、儀式、價值。這樣的「華人性」並不等同「中國性」。若比較華人與中國人，前者是以歷史、血緣與文化想像的起伏不定為內容；而後者則是現實與政治的表徵。「華人性」與「後華人性」擺脫了中國性的疆域束縛，但又受制於在地國的疆域以及因此而衍生的公民身分，故中國與在地兩者，是華人身分的一體兩面，表示這流動性與僵固性並存。兩種特性促成的「後華人性」，所展現的是回歸文化母體的可能性，以及由於多數華人群體繼續迴避這種可能性，而使得回歸的表現與欲望，充其量是一種不穩定或遭到邊緣化的選擇。

關鍵詞：華人性、後華性、馬華、馬來西亞研究

壹、前言

本文提出「後華人性」與「後華性」的概念，對之進行概念性的探討，作為未來分析馬來西亞與東南亞華人的研究設計主張。這個概念是針對「華人性」的研究所已經證實的，各地華人社群沒有任何具體共享的內涵，因此，「華人性」的唯一合理課題，是研究各地華人如何不同於彼此，這無異於挑戰了「華人性」作為一個分析概念的有效性。有鑑於此，據以提出所謂「後華性」的研究議程，則是重新界定身為東南亞華人的共同意義為何，進而挽回因為「華人性」概念的零碎化或空洞化，而造成華人身分無法普遍適用的研究困境。

馬來西亞面對「中國崛起」及來自中國大陸的影響，並伴隨中國大陸對外僑務的擴張，可說是在東南亞各國中，華人民族主義最顯現的國家。相當比例的馬來西亞華人一直深受「文化中國」、「情感中國」影響，值馬「中」關係經歷了新的轉變，馬來西亞華人的文化記憶及想像隨之波動。其中，更以華團領袖的表現最明顯，形成外界眼中再華化的印象。當前，在媒體與智庫對這類議題的推波助瀾下，馬華社群無可避免必須省思自己的華人身分。

有鑑於過去「華人性」主要因應的是東南亞土著對華人的識別，土著各地不同，在地土著與華人的相互識別及華人的自我識別，就有在地的特色。其結果，沒有任何「華人性」的內涵是對華人這個身分概念一致或有效的描述。華人作為有效的跨地域的身分，存在於華人社群之間，不同華人社群之間有不同的相互識別方式，但都假設華人是有效的身分意識。我們主張用「後華人性」來指涉華人社群彼此的識別。必須假設華人彼此先能識別，土著對華人的識別才有基礎。「華人性」是華人與土著之間的差異（或拒絕差異）政治，「後華人性」是華人彼此之間的認同（或拒絕認同）政治。

貳、「華人性」的概念已不充分

馬來西亞華人介於華人民族與馬來西亞公民之間的「雙層認同」，成了重建新華人身分的關鍵。對居於這樣邊緣位置的馬來西亞華人，一般慣於用混雜、多元來形容其身分認同，這是馬來西亞華人有別與新加坡華人之處，因前者不是以華人為主的國家，故不如新加坡的多元文化政策，是著眼於維護華人以外的群體。其結果，隨著外在環境的演進，混雜、多元的華人意識所反映以及衍生出的馬華的「華人性」，因其對馬來人與中國人均屬於邊緣，就會有不斷的調整。

固然，個別地方的華人移民之所以有意識地繼續身為華人，是因為他們仍然借用著各種共享的或共同可採納的華人文化資源，彼此認識，相互溝通，並建立自己的價值觀，安排自己的生活及社會交往方式，以致於形成彼此不同卻又相互認同的某種雜匯的「華人性」。

這樣籠統卻又無所不在的「華人性」，不可避免影響了包括大陸在內的外界，尤其是在看待馬華社群時採用的角度，甚至還影響各地華人認識中國或其他華人的方法，進而彼此在互動時產生溝通與行為上的不對稱，不能充分傳達各自根源於不同教育背景，國家處境，以及歷史文化記憶的自我認識或對華人、中國人、中國的認識。這樣彼此認知中出於中華文化的同源，卻又實際各不相同，因此無法一言以蔽之的多元身分，姑且可稱之為「後華人性」。

一、「華人性」的「同」：

海外華人在共享文化資源的經驗中，華人彼此之間不受經驗的差異而能免於相互衝突。由於在馬來西亞從早期的三集團的區分——華僑或海外華人、在地華族、土生華人，¹ 反映了也促使今日馬來西亞華人身分認同的分疏，他們雖然受到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影響，但仍然能夠識辨彼此，他們之間對民族的認同的不同，但都有潛能可以選擇來彰顯華人身

¹ Wang Gengwu,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2003).

分。所以，華人作為一種身分的可能性，只屬於那些能被識別為華人的
人。所謂「華人性」，就是自我識別或接受識別為華人的可能性。

二、「後華人性」：

若根據過去的研究，定義華人是沒有意義的事，因為他們各自不同。
所謂「後華性」，便是在「華人性」不可定義的條件下所提出，強調的是
相互識別或再識別為華人的過程。透過東南亞華人對身分認同的選擇，可
以歸納再識別所仰賴的資源為何，機制為何。「華人性」因其多元、雜匯
而無法一概而論，但只要具備再識別的意願，便可以參與建構華人這個共
通的身分。因為「中國」的崛起，當地的華人身分備受關注與爭議，再識
別的過程本身也就充滿不確定性。「後華人性」固然有賴其他華人社群的
識別，但必然具有強烈的在地性，因此，每一次再識別的開展，也就不能
為外界充分理解，所以再識別同時具備了共同身分的想像及差異政治的再
確認。其結果，「後華人性」一方面在重建某種想像的「華人性」，另一方
面排除了演化成為「中國性」的可能。

「後華性」認可華人遊走在連結與差異兩種身分策略之間，根據時空
與對象而調整，因此，難免會產生鏡像效果，這猶如使得原本具有穩定性
的身分認同，出現了因對象而不同的角色化現象，亦即，華人身分成為一
種角色，是否華人及如何華人均具備不確定性。

參、馬來西亞「華人性」的政治

一般華人學者在研究「華人性」這個概念的時候，經常會以馬華文學
作為文本分析的對象，這些文學的內容幾乎是直接面對敏感的身分認同問
題。遑論若是從華人學者、華團領袖、華人媒體的敘事角度來整理「華人
性」的內涵，更必須直接處理涉及身分認同的「華人性」論述。其中，
「華人性」變遷的歷史是不可或缺的分析基礎，因此，研究者不能忽略馬
來西亞華人歷史記憶對民族認同的影響至深。從中國南來馬來（西）亞的

華人族群，絕大多數無法擺脫也不願意擺脫祖先的文化。這一方面是在感受異族的壓力下而有意識地堅持，而另一方面也有其自然的趨策力。畢竟因為文化是一個民族安生立命之道，何況中華文化在歷史上具有優越性，又因其內在的豐富性及結構性而得以有系統的傳承。在過去的研究與報紙報導中，在在流露華人是多麼的眷戀自己的中華文化，為此而感到自豪。尤其是對自己的母語（華文）教育的堅持，不時因為學習華文的處境受限而感到焦慮，箇中道理在於，維護華人文化無異是向主流的在地民族展示並建立自己尊嚴的不二法門。

馬來西亞華人是在政治壓力下而有強烈自我意識，因此，華人在自我建構的過程中，其採用論述常強調「民族」與「文化」的概念。馬來西亞華人就是以這兩點作為集體記憶的主要基礎，建構「華人性」。

在建構華人身分這個過程中，除了原鄉情感、文化記憶及想像成為推動的力量之外，華人的身分意識還受到主流族群的「馬來特權」的影響，形成華人處於二等公民的認知。在華人情感的傳承下，因應主流社會歧視性的政策，使華人的身分認同呈現出情境性與策略性，其間所體現的是公民身分與民族身分之間的折衝，進而在各界均願意維持民族情感、文化鄉愁的同時，其「華人性」就有了各自不同的開展，成其為一種可以共享卻不可共語的「後華人性」，預示了更大的轉變及流動。王賡武曾指出，「華人性」不是一個單一的、一成不變的概念。不同地域、處於不同歷史進程中的華人，其「華人性」是不同的，出身同一背景的華人也可以有不同的「華人性」。實際上，「華人性」也不會固定下來，它是一種流動（fluid）性質的概念。可見，「華人性」這個概念作為身分的指標已經不充分。

普遍而言，華人學者均同意「華人性」這個概念是非常抽象、難以界定、不斷流動。在研究「華人性」的文獻當中，研究印尼華人身分認同的雲昌耀，透過 1998 年後印尼重新建構華人與非華人之間關係的過程，來重新概念化「華人性」，具體指出「華人性」內涵的流動過程。² 若是透

² 雲昌耀，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新北市：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12），頁 253-259。

過華團領袖的意識形態，來追蹤另一脈絡的「華人性」，其間彈性更大，因為華團領袖在語言、地位、文化等面向上需要多方接觸，只能不斷進行策略性的流動。包括華人媒體亦是如此，因為他們面對的對象有不同的預期與不同的資源，帶來不同的挑戰與機會，因此，在實踐上不能根據一套自我理解就充分因應。

「華人性」具有超越本質及價值觀等等的特點，如人類學者王愛華（Aihwa Ong）與 Donald Nonini 便提出此看法：「華人性」已經不再是以多少的華人價值觀或者準則來衡量華人的屬性或者本質，取而代之的是將各種「作為華人」的方法的多重性，視人際關係與團體關係銘刻到與全球資本主義及其現代性有所關聯的力量與過程。³ 不過，他們沒有顧慮到華人群體之間繼續使用某些可以共享的文化資源，不同華人群體之間所共享的文化資源固然不同，但是他們所共享的文化資源綜合起來，仍可藉以為彼此選擇性的識別或規避華人身分的一種方式，因此，只強調華人已經各自分殊而毫不相同，似又不能掌握到因為文化資源的共享所能提供的機緣。這些紀元充滿可能性，仍然對於爾後華人身分意識的流變、堅持、回歸或消失，有著事先無法規範的作用。

這就是「後華人性」的概念超越「華人性」之所在，因為「後華人性」以「後」的概念體現差異、流動與再識別的潛在可能性，而保留「華人性」的概念來指涉共享文化資源提供的相互識別能力。

除此之外，根據王賡武的研究，早期馬來西亞華人身分認同分別聚焦於 X，Y，Z 等三個群體，⁴ 而延伸到現今已經超過三個集團，他曾在一項訪談中同意，當下的華人群體變得更多元，不能夠仍然從某個單一角度或只設限在三個群體，來掌握馬來西亞華人的身分認同。他提到的幾個關鍵變化是，早期的海外華人的分類是從華人移民的時間、背景、移居地點等

³ Aihwa Ong and Donald Nonini, "Introductio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as an Alternative Modernity, in *Ungrounded Empires: The Cultural Political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Aihwa Ong and Donald Nonini (eds.),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p. 3-38.

⁴ 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臺北市：商務，1994），頁 156。

角度切入，因為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不同群體的華人的認同之間便有差異。另一方面，從文化及教育為研究對象的陳志明則從教育分類，他所區分的三大類別包括，受華文教育的華校生；華、英雙語教育的華校生；英校生及土生華人。⁵ 這些群體的分類由於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也在不斷的轉變，因此至今無法定義出到底目前維持現狀的多，還是已經多元發展到不再能夠輕易判斷類別。

這些日趨細緻而多元的發展，導致分類益加困難，然而又仍能夠彼此追蹤出他們的華人身分識別，這也是何以要改而採用足以凸顯這種命名困境的「後華人」的概念，作為一個總結性的身分範疇，並且保留了這些文化資源在未來所可能啟動的再識別過程。可以說，「後華人性」的研究所在，就是華人彼此再識別或去識別的資源、機制及策略。

肆、學術文獻看「華人性」

王賡武眼中的「華人性」與「中國特色」相關，他在《離鄉別土境外看中華》一文中強調「中國特色」，不管是社會主義也好，或者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也好，使用這些詞的時候，這個關於「中國特色」的提法，和海外華人所謂「Chineseness」的提法，有其相同、相似的地方。⁶ 外國人看海外華人（現在的東南亞也是如此），未必能界定什麼是「Chinese」。其中一個簡單的解答在於民族意識，亦即無論現在「Chinese」接受某某國籍，接受時下的西方文化、教育，接受了本地教育、語言，本地的文化菁英、文化價值觀，但仍舊堅持他們是華人。而「後華人性」之所以繼續可視為「華人性」，正是在於他們多數尚能透過共享的文化資源，即使承繼的是不同面向，但卻足以主觀的接受相互識別。其中，華團經營的媒體就是在共享文化資源的條件下，不斷進行再識別及自我檢視的社會機制。

研究海外華人課題的華人學者王國璋認為，華人身分與地位處於

⁵ 陳志明，遷徙、家鄉與認同－文化比較視野下的海外華人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⁶ 王賡武，離鄉別土：境外看中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5）。

「虛」與「實」之間—「實」為華人在馬來西亞的公民地位，相比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華人在國內的地位似乎不差，有著實質的公民權益；「虛」則相對是指在法律明確保障公民權利之餘，仍在包括政治、經濟、教育及文化方面備受壓擠，淪為實際上的二等公民。⁷ 王國璋指出，最關鍵的是，馬來西亞華人社群終究無法自外於國內整體的大環境，馬來主流社會對土著給予特權的決心不變，則馬華公民（馬來西亞華人）地位難再有所提升。歸根究底，馬來西亞仍未能超越單一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桎梏。

陳昌宏在其論文中針對新加坡華人的「華人性」指出，華人一方面隨著時代和地域的不同，而不斷發生著歷史性的變遷，而另一方面又在演變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穩固的、為東南亞華人普遍接受的核心特徵。這種影響會透過世代傳承，直到今天仍然對中國社會和文化具有深刻的影響。⁸ 準此可藉新加坡華人作為馬來西亞華人參照，因為兩國華人原來並未區分成兩個國度，祖先皆是從中國南來馬來亞，再從移民成為在地國家中離散（diaspora）的族群。他們再進一步變為當地的華人，亦即是本土華人，以致於外界對於各地華人認同的變化，不能輕易的以單一、多元來定義，必須承認有各種因素促成華人身分不同內涵一直在開展或循環，特別的是華人本身因其與在地主流民族的區隔。

從華人學者及華人的歷史脈絡來檢視，發現華人是在傳承中華文化的過程中，維繫了自身的民族尊嚴，但這樣的民族認同又無法成為主流族群的一分子，在政策邊緣淪為「二等」公民，又促使華人傾向認同自己祖國的民族與文化。「中國崛起」與「中國夢」引發的回應，無異就是再度掀起向雙趨衝突——應該向主流民族的政治認同靠攏，或彰顯對強大祖國的文化認同？準此，我們進一步主張，「華人性」可以說是各地華人與當地土著社群區隔之所在，因此，當然不可能有固定的內涵，對當地土著而

⁷ 王國璋，「真實與虛幻：馬來西亞華人公民地位與人權論述」，載於陳鴻瑜主編，海外華人之公民身分與人權（臺北：獨立出版，2014），頁 301-330。

⁸ 陳昌宏，新加坡中國研究的知識密碼—華裔離群者的身分策略與能動性的展現（臺北：臺灣大學政治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2011）。

言，華人有其特色存在，但整體而言，「華人性」則沒有共同的特色。如果說，「華人性」是存在於華人與土著之間的差異，那麼，「後華人性」就是各地華人社群之間的差異，「華人性」是關於華人接受或拒絕土著對自己的識別，「後華人性」便是華人接受或拒絕其他華人對自己的再識別。理論上，「後華人性」確認了華人研究的基本主體，而實踐上，「後華人性」彌補了「華人性」的空洞化。

另一個看法則是出自涂經詒教授，他認為研究「華人性」，正是為了要改造「華人性」。⁹ 他認為，早期的思想家對「Chineseness」的研究具有3個特點：首先，因為對「華人性」的研究有迫切的現實針對性，難免受到某些意識形態作祟，故而他們所解讀的「Chineseness」存在若干各有目的所導致的差異。其次，雖然彼此討論的「Chineseness」可能存在部分差異，但共同的特性認知在於其共享的前提，亦即一個普遍而實存的中國文化與抽象的中國民族性。第三，雖然研究者的立場、環境和意識形態等背景因素，孕育出對「華人性」的不同解讀，涂經詒認為早期的學者對此缺乏充分的自覺，並且存在著一種研究者和研究對象間的「主客二分」的關係，研究者可以置身於所研究的「Chineseness」之外。

許多研究「華人性」的學者，包括涂經詒在內，試圖改造「華人性」，但是「華人性」是應該從華人的言行舉止、生活環境、語言、文化出發，或是回到原點，而從血緣、文化層面去解釋比較合適？顯然，華人這個概念並不是源自國家或者國籍，而是來自「文化」的概念，因此，從文化記憶及想像切入去檢視「華人性」較為適合，並能夠隨著時空而調適，從而識別出各種不同的華人身分認同。文獻的主流中，「華人性」比較趨向王賡武的解釋，他以新加坡華人為例，認為他們的出發點中，具有某種該有的華人的特色，王賡武特別提到李光耀及新加坡華人對「中國」的看法，王賡武是從李光耀的國族身分處境去分析：「他們（新加坡華人）有的在新馬住上幾百年，華裔在東南亞成長，他們唯一的家就在這

⁹ 陳昌宏，新加坡中國研究的知識密碼—華裔離群者的身分策略與能動性的展現。

裡，他不可能回中國，根本中國沒有家，他們已經是本地人。」¹⁰ 他形容「中國」在東南亞華人眼中就是別人的家。同時，王賡武在訪談中提到特別欣賞李光耀與家人的關係，他家是一個非常美滿的家，家裡父子關係很好，一家都很孝順，其實從傳統中國人來看，是相當好的榜樣。

相對於華人學者，西方學者理解中國時所採取的不同角度中，較為實際的是從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民族來辨識中國。這也就是說，文化認同與國家、政治認同有所區別，這兩組概念甚至是衝突和具有張力的。文化認同是深植於歷史觀和社會價值中。若干長久居住在東南亞的華人，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根深蒂固。他們曾經輾轉在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之間的拉鋸和撕裂，尤其是知識分子，在馬來西亞獨立前後面臨了中華的文化認同與馬來西亞的政治認同的痛苦抉擇。這表示文化認同牽涉到另外一個範疇，即族群或族群關係，國家的成立就改變了族群的區別方式，使得群與群之間在權利義務上出現不平等，文化認同既是華人自尊的基礎，也是在地土著區隔華人的依據，更是與「中國」雙邊關係起伏所必然影響或參照的對象，所以文化認同成為核心課題。

在早期從中國南來的僑民是以籍貫作為身分的象徵，再漸漸形成幫、群的概念，並形成了是祖籍的概念，因此，華人社群裡就有「方言群」，而非「族群」。這方面似乎有異於臺灣的族群研究。比如所謂「方言群」，是為了更確定當時的華人是「以「幫」和「方言群」來作為身分的區分，是早年作為強化「華人性」的重要識別之一，而其中涉及的「方言」與「幫」群，恰是概念上具有普遍性，而實踐上具有在地性的華人文化資源，是分疏化以後的華人社群藉以再識別的重要的文化資源，這也是「後華人性」的緣起之一。

不過，一些西方學者比如 Gregory Stone¹¹ 就提出，認同不是屬於個

¹⁰ 王賡武於 2013 年在國立新加坡大學接受李慧易的訪談如是表示。

¹¹ Originally printed as Gregory P. Stone, "Appearance and the Self," in *Human Behavior and the Social Processes: An Interactionist Approach*, edited by A.M. Rose.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62), pp. 86-116.

人的所有權，而是關於個人歸於社會的屬性，其基礎在雙方同意的角色責任及權利，亦即是說族群認同來自互動。換言之，海外華人與中國的互動頻率可以主導著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學者 Harold R. Isaac 則認為，族群認同是由一組現成的天性與價值組成。出於家庭的偶然，在某一時間、某一地方，從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的那一刻起，他就與其他人共同擁有了那一組天性與價值。¹² 王宏仁、郭佩宜指出，離散族群的移動與活動，許多都是跨國界的，這些跨國活動，與特定的族群或想像有關係 (origin of ethnicity)，華人到中國發展特別有熟悉感，以為他們享有共同的語言。¹³

伍、再識別作為華團領袖的身分策略

在馬來西亞具有一個特別的現象，許多華團領袖在活動上或者他們致詞時，一般都使用中文（華語）發言，又或者會加入一些方言（閩南語、福州話、粵語等），這都是他們習慣使用的語言，一來可以突破彼此之間未必熟識而造成的隔閡、二來是對原鄉祖籍的情感表現，同時在面對中國人的時候也方便交談。按照「後華人性」的研究設計，研究華團領袖非常貼切——探索他們對民族與公民之間的身分策略，特別面對「中國崛起」、「中國夢」的號召，以及「中國」僑外事務的參與，並進而與「中國」的關係日益發展成為常態。雖然這些華團領袖來自不同地區，祖籍不同，但是他們堅持自己某種面向上的中華文化。他們平日的表現與對「中國」的熟悉，以及文化的認同，雖然不易表達，但是他們居於在地的文化生態中，卻保持原鄉情感，近年更與「中國」的互動越來越密切，實際也無法抗拒與「中國」取得更密切連繫的吸引力，更無法剪斷中國的臍帶（文化）。華團領袖正是協助「中國」發展僑務及外交的關鍵的人物，他

¹² Harold R. Isaac and Lucian W. Pye, *Idols of the Tribe: Group Identity and Political Chan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¹³ 王宏仁、郭佩宜，「導論：跨國的臺灣，臺灣的跨國」。見王宏仁、郭佩宜編，*流轉跨界：跨國的臺灣，臺灣的跨國*（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9），頁 1-32。

們因此對「中國」有著剪不斷的文化記憶、文化想像、文化認同及經濟誘因等各種不能輕視的因素。

華團領袖對復興中華文化的熱情，確認了民族研究的一個老生常談，亦即民族意識是須要建構的。固然在刻板印象中，民族是有共同血統、語言、文化、生活習慣等的人群。最早就是基於這種對民族的定義，許多考古與歷史學者由歷史文獻與考古資料中蒐尋語言、體質與文化特徵等材料，由相似與相異的類比中溯源，希望由了解中國人種、語言與文化的起源，來詮釋中國人的本質。60 年代末起，人類學對族群現象與理論研究有革命性的發展；強調主觀認同與族群邊界（而非內涵）的重要性，進而探索族群認同的工具性（利益）與根基性（情感）基礎。比如王明珂的「民族」概念就結合人類學族群理論與集體記憶理論。¹⁴

民族與文化相互影響至深，但是世世代代的馬來西亞華人在其身分認同上遭到馬來西亞政府的政策綑綁，其次是公民與民族的身分上已在不同背景下持續變遷，因此增加極大的變化，幾乎不再有意要重新恢復建國前對中國的全盤認同，除非是少數一直與中國的互動密切，如華團領袖，或對在地的不平等極度疏離。現在，「中國」軟實力的擴張，展現文化魅力，對馬來西亞華人是衝擊，也是契機。華團領袖個人為了回應「中國夢」，在公開場合中的「中國」的論述、想像中，可以發現他們對中國的認識或中華文化的價值觀確實是有變化，他們對中華文化的提倡，體現出重啟中華文化資源進行自我再識別的努力。

與華團領袖相較，馬來西亞華人整體在自身的文化記憶或者是文化想像中，是否有意無意也在不斷界定他們對民族身分的認同，以及強化對中國的想像？馬來西亞華人自始，便在民族與公民兩重身分之間徘徊，為了生存或尊嚴而強化某一個身分的時候，便面臨著對另一種身分的「排他性」。上述文化記憶與想像，極可能導致華團領袖與中國的關係變得更密切，這無非是喚醒歷史記憶，來修補斷裂的記憶，透過像是原鄉的情感、

¹⁴ 王明珂，*華夏歷史邊緣*（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中國情懷予以重新連接，如此一直都在變化及演進中，不可避免就將在地的中華文化開展出不一樣的內涵。陳志明就曾根據中國意識來區別華裔對中國的態度，解釋為這是一種文化相關性（cultural relevance）在的認同建構，種族意識較強的華人雖然不在政治上認同「中國」，但卻在文化上認同「中國」。他們中的一部分仍視「中國」為「祖國」。¹⁵

果其然，馬來西亞華人在身分認同上出現變化，從原本已有的「華人性」，進一步分疏，而開展出「後華人性」，其間的差異在於，華人與華人之間的比較，可以從地域、世代、階層、部門入手，因而更明顯的突出了作為馬來西亞、資深、富裕、商界的華團領袖，選擇對固有文化資源的大加運用，與其他華人群體的選擇頗為不同，但又可以為他們所理解、識別、贊成或反對。舉例而言，華團領袖視華文教育視為民族事業，在其他東南亞地區較為少見。

準此，以雜匯認同分析華人或馬來西亞華人是不足的。¹⁶「後華人性」更強調華人的文化源起與因此而獲得的文化資源，以之作為一種共同想像的來源，是文化經過雜匯以後的群體，繼續有可能彼此認同，並透過他們共同對一個「祖國」文化的想像，以及對固有文化資源恢復使用的能力，讓著重強調差異的雜匯認同，不能解釋何以已然分疏的「華人性」，仍然要以華人的身分意識不斷再現？也就不能看到「中國崛起」導致若干階層中華人意識的鞏固效果，是循何種機制而來？這種與「中國」重新取得聯繫的可能性，不論是群體內生的，或是外界刻板印象中的，都是因為與土著混居而分疏的華人群體，繼續能彼此識別為華人的深層基礎。不管是廣泛或狹義的去界定華人具有「後華人性」，因此都比單純使用「華人性」更能聚焦。

外界以「中國情意結」（China complex）來形容有親「中」傾向的華

¹⁵ 陳志明，遷徙、家鄉與認同——文化比較視野下的海外華人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頁142-143。

¹⁶ 游雅雯，「馬來西亞華人認同的形塑與變遷——以馬華文學為分析文本」，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11卷第1期（2015年1月），頁139-70。

團領袖，而這些領導人物的個人生命經驗中，對「中國」或許真的抱有精神與文化上的情感，他們在「中國」的與在馬來西亞的親身經驗，形成這種情結是自然不過，但是引起爭議的是，這種身分意識及其伴隨的利益關係，遭外界冠上戲謔性的「中華膠」稱謂。若以陳凱希與張曉卿兩位華團領袖為例，陳凱希將其集團命名為「海鷗」，以表達其身分是中國來到馬來西亞的公民，既認同馬來西亞人，也同時懷念原鄉。張曉卿投資《下南洋》紀錄片，他希望透過影片中重塑「華人性」，並界定文化記憶在華人華裔心中的想像。¹⁷ 其實，海外華人想像的中國是與中國人的中國之間，存在空間、世代等方面的差距，畢竟海外華人對中國想像與認識，是透過祖先的口述，後來再到「中國」旅遊探親來延續，這之間的差別在於其心中想像的中國，與現實發展不輟的「中國」，難免有扞格。

此外，馬「中」關係也敦促著馬來西亞華人（尤其華團領袖）中介於「中國」與馬來西亞之間，作為其中一道維繫的橋樑。對「華」政策已經是馬來西亞政府與公民之間關係的轉折點，尤其是近年來的隨著全球化、政局及世代變化，最關鍵的是領導人的施政方針促使海外華人的身分認同再度浮現，華團之外的其他華人群體隨之調適自身的身分意識的可能性隨之浮現。故當「中國崛起」之際，馬來西亞當地華人抱持的，是一個即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情，再重新反省華人需要的中國認識是什麼。

不過，華團領袖的身分策略似乎並非主流。廖建裕其研究華人對中國的認識時指出，中國這個概念是一個受限於文化範疇，且其內涵與各地東南亞華人所在國家息息相關。他認為東南亞華人難以找回對中國的全盤認同感，主張東南亞華人與中國人本質上並不相同。¹⁸ 廖建裕的中國認識是從在地出發，有著身分、情感上對中國的隔閡，並強調東南亞華人為主體。這一點與馬來西亞華人普遍強調自己是馬來西亞人的論述相似，有別

¹⁷ 何國忠，*馬來西亞華團領袖（華商）與文化中國*（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出版，2007）。

¹⁸ Leo Suryadinata, *Understanding the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ion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2007); Lee Hock Guan and Leo Suryadinata (eds.), *Language, n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7).

於「中國」的中國人，並以國籍作為主體認同，也應該是在馬來西亞華人中占據絕大多數，亦即，不管是政治及文化皆認同馬來西亞。在國家認同上，出生地是一個關鍵，許多第二代以後的馬來西亞華人對中國的想像或認識有限，一部分華人也會抨擊其他那些情感上傾向「中國」的華人，而華團領袖是他們首選的攻擊對象，稱華團領袖為「中華膠」。

華團領袖之間無形中存在一種焦慮感，因為他們無法因此就必然獲得「中國」的資源，卻已經也無法走入馬來西亞體系的中心。「後華人性」可以解釋馬華的困境，因為就是華人之間相互識別的資源豐沛，並且活動頻繁，無論如何與「中國」或華團領袖切割，華團領袖屬於馬來西亞華人顯而易見，則華人與土著的區隔更是始終一目了然。此何以「中國」的強大變成是一種具有挑戰的論述，恐懼感反而在華人中蔓延開來。在部分的馬來西亞華人圈子中，不斷的提醒著馬來西亞華人時時刻刻要擺脫自己民族的身分，這是由於馬來西亞政府政策拒絕將華人納入土著，而只有公民或者非土著身分的華人，一直都受被邊緣的危機意識所困。這樣的「後華人性」，就體現為拒絕再識別卻難以成功的策略。

陸、結論

許多東南亞國家的政府推動同化的政策，譬如印尼或泰國的華人已被同化，特別是印尼華僑經過排華慘痛事件後，為了生存及現實情況在情非得已之下，認同所謂印尼籍的身分，甚至以印尼文的名字作為一種對於國族認同的表述。但是同化這政策似乎在馬來西亞並不奏效，更不適合研究馬來西亞華人。馬來西亞華人一向是遵循民族建構的想像，而成為政策上必需管制的對象。最後導致當下的馬來西亞華人在認同上雖稱自己為馬來西亞人，但繼續對華人這個身分心情複雜。

在華人身分的認同與融合入本土的調適中，馬來西亞華人的「華人性」受到各種因素影響，其間的身分轉變，形成了從土著所指指點點的

「華人性」，延伸至華人彼此指指點點的「後華人性」。在回應「中國崛起」的當下，對馬來西亞華人身分的自我調適，需要提出比雜匯、多元等等更為敏感的概念如循環、復興、再現。這些概念儘管並不是普遍有效，但揭示了「中國崛起」的印象與實踐重新聯繫了本已分疏的華人群體，與中國關係密切的身分概念「炎黃子孫」、「中華文化」、「中國夢」均獲得不吝使用，比如「一帶一路」等新興詞彙使用益加頻繁，尤其是在華人媒體的報導或者華團領袖的言論中，更為明顯。

海外華人與中國大陸的互動，基本上是透過華文媒體，而多數的華團領袖，都會時時刻刻有意無意的在媒體上對「中國」喊話，他們經常圍繞在經濟、文化等價值取向，同時透過馬來西亞華人對原鄉中國的論述，二十年來「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大規模新移民進入海外華人社會、「中」外關係空前密切等等，都導致海外華人社會的急遽變動。這種變動雖帶動華僑華人社會地位的提升，但也引發華人社會內部結構的巨大挑戰，並使華人社會與當地社會的關係充滿變數，特別是海外華人對中國的複雜情感，常常不是大陸的中國人或者外人可以體會的。相對的，中國文化與歷史是一種輪迴，想不到又有了成真的可能，雖然東南亞華人所體會的固有文化，必然不同於經歷文革與改革的中國人自己的體會。

「後華人性」的形成，在於因應在地情境而衍生出的不同文化記憶，繼續使用相同的文化資源，確保了華人與華人之間的相處模式、共事及對中國的情感，其間儼然具備某種隨時可以重新分享的概念、儀式、價值。這樣的「華人性」並不同於「中國性」。若比較華人與中國人，前者是以歷史、血緣與文化想像的起伏不定為內容；而後者則是現實與政治的表徵。「華人性」與「後華人性」擺脫了「中國性」的疆域束縛，但又受制於在地國的疆域以及因此而衍生的公民身分，故中國與在地兩者，是華人身分的一體兩面，表示這流動性與僵固性並存。兩種特性促成的「後華人性」，所展現的是回歸文化母體的可能性，以及由於多數華人群體繼續迴避這種可能性，而使得回歸的表現與欲望，充其量是一種不穩定或遭到邊緣化的

選擇。

有鑑於此，華人與華人之間的共享文化資源所確認的，是中國因為能作為一種資源，而能進一步開展成一種身分。大抵而言，各個華人社會之間越來越趨向為資金、產業、人才和勞動力的互補關係網，其密切程度正在超過華人社會和在地主流社會之間的關係，這包括東南亞華資與臺港華資之間的融合。以中國大陸為核心的東亞華人資本、產業、勞動力和市場的整合已成趨勢。¹⁹ 這一點也是未來在進行「後華人性」研究中可進一步發展的。當海外華商與「中國」之間經貿整合而鞏固了關聯性，或者「中國」企業到東南亞駐點的發展與趨勢日益明確，「後華人性」的趨勢是否將更加有創意，以容許共享的文化資源重新獲得啟用，甚至影響華人的身分策略與華人意識，導致其民族認同也隨之而轉變？或者因為利益關係導致文化認同的邊緣化，反而破壞在地華人民族自尊的精神文化面，而如此「中國夢」所帶來的「後華人性」，就反而是文化上的夢魘？

¹⁹ Guotu Zhuang, "Trends of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 in East Asia: As Mirrored from Overseas Chinese Investment in Mainland China since 1978," *Ritsumeik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6, vol. 4, pp. 1-23.